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 历史方音研究

李军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历史方音研究/李军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108-9

I.①江… II.①李… III.①赣语—方言学—
文献—研究—江西省②赣语—语音—方言研究—
江西省 IV.①H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0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历史方音研究

李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108-9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新语音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序《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历史方音研究》

刘晓南

汉语语音史研究肇始于宋代古音学。自从宋儒吴棫在《毛诗补音》中偶然涉及中古麻韵从段声的“瑕”等字有秦晋读如胡、魏晋读如何的古读，试图从时间维度辨析复杂的字音变化之后，过了几百年，直到明末陈第“时有古今”“音有转移”的表述出现，这种偶然提及的时代语音发展猜想，才成为一种理性的认识。此后，随着古音学长足的发展，语音史的轮廓也愈见清晰。到民国初期，1918年钱玄同《文字学音篇》首次提出了划分为六期的语音史框架。自此之后语音史作为传统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但扩展了研究领域，而且进一步促动了传统音韵学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催生现代音韵学的强大动力。

从清初至今，几百年间语音史研究高潮迭起，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都有深入的研究，大著作佳如雨后天春笋层出不穷。今人综括总结前贤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连缀完成的语音史，迄今已达十种之多。然而，“语音史”的一个“史”字，似乎先天就框定了它只关注时间维度上“史”的变迁。展望已面世的各种著述，无论这个“史”的分期有多少，确实都是顺着时代更替做历史纵向的叙述，于是所谓“一线制”框架遂成定式。至于“史”上各个分期的共时层面，往往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音系（或曰“时代音系”）独自支撑着场面。

“时代音系”固然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语音，但能否全面表达一个时代的语音细节与各种不同的表现？我们知道，汉语从来就充满着方言差异。“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大儒颜之推的这句名言，简明地表述了这个人尽共知的事实。可是，语音史从一开始似乎就对历史方言语音不感兴趣。以至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任何一种语音史著作，都只有一个一个音系依时代次序递进，而看不到具体时代方音的全方位描述。

其实，历史方音问题并非人为地有意遗忘，清代古音学之父顾炎武很早

就试图利用古方音来解说《诗经》及群经中的特殊押韵,在《音学五书》中提出了古方音的假说。但不幸的是,在他的古音学说大为成功的同时,他的古方音说却黯然失色。究其原因恐怕就是推测的成分居多,证据不足,无法对历史方音做定性、定位的论证,反而是十五国风用韵大同小异“无间风雅”的表现,使得“同文之治,不囿方言”之说盛行。于是有清一代,赞成古方音说虽然仍大有人在,具体研究却无实质性进展。

20世纪初,现代学者林语堂、罗常培等反思了传统研究的不足。林语堂尖锐批评了传统音韵学:“中国音韵之学,有清以来,如顾、江、段、王等考古非不博,用工非不勤,但所得之结果,实无甚足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他接着说:“新的音韵学,非利用方言的调查以为佐证不可。”又说:“凡古书都有浓厚的方音色彩,要在我们能用适当的方法去考求他。”(语见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所谓“新的音韵学”实际就是“新语音史”,明确提出要以适当的方法去考求古书中浓厚的方音,以佐证新的音韵学,实际是企图构建有别于“一线制”框架的、能体现空间维度的新语音史。罗常培更进一步说:“纵的方面,想把中国旧来关于方言的材料,除去别有专书者以外,如《公羊传》,《周礼》,《淮南子》,《世说新语》,唐宋人笔记,五代和宋人的词,元明人的南北曲,禅宗和宋明儒的语录,宋元平话和近代白话小说,旁及史传文集中参用语体的篇章等,凡是有关方言的零金碎玉,都结集起来,作一番方言学史的研究。”(见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周刊之《方言专号》罗常培《卷头语》)总而言之,依这一批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熏陶、又有着扎实国学基础的学术大师看来,音韵学或语音史的出路在于方音史。他们发掘资料,旁搜博证,殚精竭虑,在兹念兹,于是有了《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等先秦方音系列论文、有了汉代《方言》的方言分区研究、有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等等著作,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等上古、中古方音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历数十年之艰辛,终于成功地将“空间维度”研究引入了语音史领域。时至于今,我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以“天下同文”来否认历史方音在文献中的存在。毫无疑问,旧有“一线制”语音史框架需要更新,新的语音史框架必将包含两个层次:上层层是通语音系,下位层是历史方音。新的语音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的历史方音,必定要包括历史方音的内容。语音史的更新在于方音史,语音史的突破更在于方音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近代语音史的兴起,以鲁国尧先生宋词用韵研究为代表的宋代通语及方音史研究异军突起。在一大批学者共同努力下,大宋王朝版图许多区域的方音得到了系统的研究,10到13世纪的汉语历史方音特色及分布逐渐明朗。然而宋代方音研究者无时不感到一个严重的先天

缺陷；研究材料不足。尽管宋代编纂了语言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韵书，但却没有成体系的方音韵书或字书，使得今人做历史方音研究难以得到系统、集中的材料，从宋人诗词用韵、诗话词话、笔记小说、经传注疏等文献中收集到的方音语料，揭示的往往是“零金碎玉”式的方音特征，无法归纳具体方言的音系。夏汉对音的研究虽然有所突破，但仍然困难重重。况且公元10到13世纪的宋代距离现代仍然非常遥远，近乎千年的时间跨度，仍然存有大量的空白，这也是为什么语音史研究进展到现阶段，明清方音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的原因所在。明清方音史如果没有重大突破，新语音史的成功绝无可能。构建全新的语音史依然任重道远。

李军同志《江西赣方言历史文献与历史方音研究》(下文简称“李著”)一书就是在语音史研究这一节骨眼上，填补明清方音史研究一项空白的佳作、力作、有突破的新作。

我首先要赞赏的是该书对于研究对象的文献语料系统的发掘与开拓。与宋元不同，明清两代的韵书编纂，虽然突破了传统经典韵书体系的束缚，出现了许多描写实际语音的甚至是纯粹方音的作品，但发掘这些文献用于研究并非易事。因为对于一片尚未开垦的方音史“处女地”而言，发掘新的有价值的系统语料，决不是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这么简单。罗常培曾说，“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而我们现在必须另眼相看的東西，这就是流行于民间的方言韵书，这种书流行于各地的很多，然而搜集起来也颇不易”（语见《方言研究小史》）。说它们“流行于民间”难以搜寻，其实大多数应当说是散落民间，就算大型图书馆偶有收藏，因其“不登大雅之堂”也往往被束之高阁，难见天日。使得这批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不但缺乏研究，更是少有著录、整理与介绍。偶有人介绍一两种，坊间书肆既难见到，收藏在什么地方亦鲜有人知，更遑论还有许多不为学者所知。就像探矿，遥望茫茫大地，富矿何在？探寻不到矿藏，何谈开采、冶炼、产出成品？因此要做好明清方音研究，深入发掘文献乃为第一要务，能否开发出原始语料，在当下甚至成为是否能够获得研究成功、并取得突破的关键的第一步。李著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原始语料开拓方面有所突破，发掘出多种明清赣方音系统文献语料，不但为该书近代赣方音史研究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近代语音史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此实为本书一大亮点。

深山探宝，沙里淘金，除了知宝识宝，更需要有毅力与耐力，历险涉深，在所不惜。为了发掘方音文献，作者几乎遍访江西各种公私藏书机构，花大时间下大气力泡图书馆，一张张卡片检索，一本本资料排查，埋头苦干，细心搜寻，终于从故书堆甚至是废纸中搜寻觅得系统的赣方音历史文献。请看

作者是如何叙述发现涂铨《国音四种》稿本的：“涂铨是真正意义上最早对江西境内赣方言进行研究的学者。惜乎此书为稿本，未得以广泛流传开来，作者也默默无闻，故而其学不显，其名不彰。后来有多位学者在介绍江西方言研究概况时，都没有提到他。笔者在江西省图书馆看到该书时，竟几成片片稿纸一叠，张张布满蠹眼，幸可卒读。”读这段文字，字里行间，是不是仍可触摸到故纸堆上压着的厚厚尘灰，闻到飘浮在纸面的蠹味、霉味？个中甘辛，谁能体会！

凭着这种执着，作者获得四种三百年来的赣音系统语音文献，它们是：

(1)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 年)的江西临江方言韵书式的字书《辨字摘要》；这是目前为止研究者所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记录江西赣方言历史语音系统的文献材料。

(2)成书于 1815 年左右，记录南昌话的童蒙识字课本《类字蒙求》。

(3)清代末年江西南丰刘孚周九叔所著《翻切指掌空谷传声》。

(4)民国初年(20 世纪 20 年代初)，江西高安人士涂铨用注音字母记录高安土音的《国音四种》。

这四种赣方言历史文献除《辨字摘要》《翻切指掌》曾有人做过介绍外，其余两种之前均不为研究者所知，属于首次发掘，时代涵盖了三个世纪，所记方音分布于江西赣方言的临江、南昌、南丰、高安，包含了现代赣方言的代表点在内，时空定位准确，内容丰富翔实，有效弥补了宋元方音研究缺乏方音韵书字书系统材料的缺陷，使考求历史方音系统成为可能。

通过细致研究四种文献，分析其结构，归纳其音类，比较异同，破解隐含其中的语音信息，李著首次提出了 18 世纪以来直到 20 世纪初近三百年间江西赣方音三个音系：

- 一是《辨字摘要》反映的距今两个半世纪以前的江西临江方言文读音系；
- 二是《类字蒙求》直音记录的近两百年前赣方言代表点南昌话的语音音系；
- 三是《国音四种》所记录的 20 世纪初高安方言语音系统。

充分展示了三大历史方音音系的细节与特征，提出了声韵配合表，尽可能详细地列举了同音字汇，完成了方音的细节展示。无异于通过这些文献做了三次跨越世纪的赣方言语音调查，将这些历史方音有血有肉、鲜明生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几个世纪以后的人们，通过这项研究成果竟可与转瞬即逝的百年甚至几百年前的方音零距离接触，这怎能不是赣方音研究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其“破天荒”还表现在，树立了有时空定位的方音系统之后，就在语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确立了一个准确的方音坐标，几百年来赣方音演变的轨迹

首次得以准确描写。这非常有利于历史语言学现代方言比较研究的转型与深化,改变传统的以平面比较为基础的纯音理推演的单一模式。在确凿的时空坐标定位支持下,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有机结合,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对照比较现代的分布与差异,合乎逻辑地演绎方音的历时发展进程。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李著吸收前修时贤宋元江西方音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研究宋元江西文人用韵,勾勒宋元江西方音特征,开发明代江西医家歌括语料中的赣音,下联清代、民国初年的赣方言韵书字书音系,再到现代江西赣音,宋元明清民国环环相扣直到现代,千余年来,江西赣方音的发展脉络初具规模。由此得出现代赣方言形成年代至迟不下于宋代的重要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有充分的语言事实支持,是言之成理的。

准确的历史方言音系的出现,不但可以揭示这个方言语音的陈年遗迹,梳理其演变脉络,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的历史事实,足以证实或证伪音理推阐的各种理论,以澄清历史真相。如现代赣方音存在中古知章组读舌尖塞音现象,非常类似“古无舌上音”,确实也有学者依据现代赣语排比语料,比较研究,得出这是残存于赣方音中的上古遗迹的观点,但也有不同意见,以致出现争论,莫衷一是。李著根据赣音历史文献得出赣方言早期的舌齿音格局是精庄知二、
、
;知三章、
、
型。确认了在三四百年前赣音知章组就没有了上古残余,现代知章组声母读、
的现象,不是古音的遗留,而是晚近知三章组声母向舌尖音演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语音内部调整的结果。应当说,由于有了文献的支持,这个论点是颇有说服力的。

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研究,李著无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书中对近代赣音系统以及方音特征的全面描写,许多都是原创性的,这将极大地推动赣方言史的发展,学术价值不容低估。但是我们仍须指出,对于赣方音史特别是“新语音史”来说这还不够。就拿文献开掘来说,虽然有重大发现,但也不妨反躬自问一下是否还有遗漏?是否还有更早时代如明代的赣方言韵书,或近代传教士所记方音资料有无值得挖掘的材料,或是否还应当扩大发掘范围,除韵书字书外,其他民间文献,如地方戏曲、乡贤诗文、家谱族谱等等都应当考虑收集整理。再说,书中行文还有或可商榷之处,个别观点或提法还可推敲,特别是赣方音的历史源流,赣语与通语的关系,客赣方言的联系等等,可能还有许多问题并未涉及,仍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说到此,笔者曾有与古代赣音相关的两条疑惑,借此提出与李军探讨。

其一,书中论证赣方言至迟形成于宋代,这与闽方言相似,但又有一点很不相似。闽以及吴、蜀等南方方音,宋人口语中早就有“闽音”“吴音”“蜀

音”等术语称之,充分显示在宋人看来这就是地方特色浓厚的方音。这是宋人从自己语感得出的方音称谓,这种称谓为何同时代的赣方言没有?宋人包括江西人虽然都认为江西人语音特别,但笔者至今尚未从宋人文献中读到有谁像称呼“闽音”那样称“赣音”或“江西音”。如北宋临川人谢逸《溪台集》卷十有一段记述云:“儒有游学于北而归者,父老幸其归也,且近谒之。顾丐其语,以为子弟之训。既语,为北人音。父老不熟于耳也。皆相顾惊愕而退,骂且笑曰:‘而祖而父与而兄弟,未尝北其人也;而母而妻与而姑姊妹,固南其音也。而曩之音家人若也,至于去其乡而易之,可乎?’”(见影印四库全书第1122分册,558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江西人排斥北音,说明方音差异很大,但他仅自称“南音”,而不称“赣音”或“江西音”。丁传靖辑《宋人佚事汇编》卷十七记载了一条佚事,南宋江西吉水诗人杨万里亦因乡音太重,被当时皇帝讥为“杨江西人,声言不清”。南宋皇族是南迁的汴洛人,他们排斥江西音,但他也不直说是“赣音”。这似乎表明虽然赣方言成熟较早,人们愿意把它看作一种方言却相当滞后,这又是为什么?方音是语言现象,也与历史文化与人文心理等现象密切相关,或许宋人罕说或不说“赣音”并非是纯语言问题。

其二,北齐颜之推(531~590之后)《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奇特的是南北朝时的北人混音,笔者现今家乡湖南平江话也全都是混的,而当时南人混读的字音,现代属南音的平江话却大多不混,大概仅有“射”与“石”在读入声时两音混同,但“射”读去声时与“石”不混。平江话属于湖南省的赣方言,这种外省的赣音却与1600余年前的北音相对应,而绝不类当时之南音,这种“时空大挪移”又该如何解释?它与赣音史有何关系?

汉语有个词叫“落成”,出于《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以诸侯落之”,杜预注:“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后世“落”与“成”连文成词,久之同义,大厦构成叫落成,大功告成。但我们更应当注意“落”的另一个古义,即出于中国最早的词汇著作《尔雅》开篇第一条的“落,始也”。以此看来“落成”之“成”绝非终结,“落”即“始”也。几千年前先贤早已指出,成功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同样,近代赣方音史虽然取得了成就,但绝不应当看作是“结束”,而应当是新的“始也”。学问无止境,成绩只是新的起点,我们期待赣方音史研究因李著的出现而得到深入与拓展,同时更期待作者继续跟进,为新语音史做出新的探索与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江西赣方言的形成历史与分布	1
第二节 现代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概况	11
第三节 江西赣方言历史语音研究概况	15
第四节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材料	16
第二章 18世纪江西临江方音——《辨字摘要》音系研究	23
第一节 《辨字摘要》简介与音系结构表	23
第二节 《辨字摘要》声母系统	36
第三节 《辨字摘要》的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	65
第四节 《辨字摘要》音系的特点与性质	93
第五节 《辨字摘要》音系构拟及两个半世纪以来临江方言的发展演变	97
第六节 《辨字摘要》音节代表字表	109
第三章 19世纪初的南昌方言——《类字蒙求》直音研究	113
第一节 《类字蒙求》直音所反映的声母系统及其特征	114
第二节 《类字蒙求》直音韵母系统及其特点	130
第三节 《类字蒙求》直音声调系统及其特点	149
第四节 从《类字蒙求》直音与现代南昌方言的比较论其语音基础	153
第五节 《类字蒙求》音系构拟及两百年来南昌方言语音演变的若干特征	156
第六节 《类字蒙求》直音音系音节代表字表	169
第四章 《翻切指掌》所反映的19世纪末江西南丰方言语音特征	174
第一节 《翻切指掌》内容简介	174
第二节 19世纪末南丰方言声母系统特征	182
第三节 19世纪末南丰方言韵母系统特征	188

第四节	19世纪末南丰方言声调系统特征	198
第五章	《国音四种》所记20世纪初江西高安方音	202
第一节	20世纪初高安方言声母、韵母与声调系统	203
第二节	20世纪初高安方言声母系统特征	207
第三节	20世纪初高安方言韵母系统特征	216
第四节	20世纪初高安方言韵母表	227
第六章	宋元以来江西历史方言语音特征考论	230
第一节	宋元以来江西方言声母特征考论	230
第二节	宋元以来江西方言韵母特征讨论	247
第三节	入声韵在宋元以来江西方言中的演变	284
第七章	余论	293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30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江西赣方言的形成历史与分布

一 赣方言的分立

“赣方言”，在方言学上是指“湘方言以东，粤方言、客方言以北，闽方言以西，官话方言以南的这一地区的方言”，“由于这一区大部分落在江西省境内，所以我们自然称之为‘赣方言’”。（何大安 2004:93~94）赣方言在地域分布上以江西为主，但在江西周边省份，如湖南、安徽、湖北、福建都有分布，这些省份的赣方言区多与江西省接壤。由于移民原因，以上一些省份的其他地区，如湖南中西部地区邵阳市洞口县、绥宁县（西北角）、隆回县（北部）也分布着赣方言，使用人口较多，内部语音特征比较统一。乃至远离江西的四川、陕西等地也零星地分布着赣方言岛（参见崔荣昌 1986、郭沈青 2008）。赣方言作为一种源出江西的方言，随着移民的迁徙，成为汉语方言中一种极具魅力与神秘色彩，也极具辐射力的方言。

不过，“赣方言”确立为汉语主要方言之一的时间比较晚。1948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语言区域图”，把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徽州方言”等11个单位。这是赣方言最早的得名，并取得和其他汉语方言平等的地位。在此前后，赣方言的分属问题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把赣方言划归“官话区”。如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语言区域图”中，赣语被划归华南官话区；1939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语言区域图”中，赣语则被划归下江官话。主张把赣方言划归官话方言的学者主要有章太炎、黎锦熙、赵元任等。黎锦熙曾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给上海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拟定的《中国语言区域图》做了一个略加调整的说明表,主张把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系、十七区,其中赣语与湘语合为江湖区,附于下江官话(参见黎锦熙 1963:12~13)。另一种意见认为赣语与客家话是同系异派的方言,罗常培《临川音系》(1940)与《语言与文化》(1950)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1937)有“赣客家”之说,赵元任(1948)也提出了“客赣方言”的称谓(1934年赵元任先生署名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语言区域图”中,曾主张把赣语区划归华南官话区。1948年《国语入门》则主张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区,其中就包括“赣客”方言)。这种主张客、赣方言合一的观点直到现在还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如王福堂先生《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一文,通过对客、赣两种方言的共同语音特征和不同语音特征的分析,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的依据的语音差异”(王福堂 1998:18)。

之所以对赣方言能否独立为汉语方言之一的问题存在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赣方言据目前的了解,缺乏独立突出的方言特征。赣东南接近客家话,赣北接近下江官话,赣西跟湘语不易划分界限,赣东一小部分地区接近吴语”。(袁家骅 2001:21)但无论从语音、词汇等语言学的角度,还是自我意识方面,赣方言不仅与其他方言有本质的区别,具有自身的方言特征,与相邻的赣南客家话也有一定的区别。赣方言不仅有独立为汉语方言之一的必要,也应该与客家话分立为两种不同的方言,不应混为一谈。随着调查的深入,学术界一般认同将赣方言独立为汉语主要方言之一。丁声树、李荣(1955)提出汉语八大方言区理论,就主张将“赣语”与“客家话”分立。各种通论性教材在谈到汉语方言分区时,大多采用七大方言区的说法,其中赣方言区就是七大方言区之一。《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1989)把汉语分为十大方言区,赣方言与客家话也是各自作为独立的方言区的。

二 江西赣方言形成的历史

(一)江西的地理位置与江西方言的形成历史

江西的地理位置,史籍上称之为“吴头楚尾”,亦称为“南楚之地”。西汉初年立豫章郡,属扬州六郡之一。唐代著名诗人王勃《滕王阁序》有“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之句。“翼轸”乃楚之分野,可见古代江西地区与吴越荆楚属同一文化体系。但史籍对江西方言鲜有记录,中国第一部方言论著西汉扬雄《方言》,并没有对江西地区的方言词汇有明确记录。

最早对江西方言进行记录的当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辶部》：“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草中为莽。”但亦属吉光片羽。现代江西周边地区方言自上古以来，就有史籍记载，有源头可溯。如“楚语”、“楚声”、“吴语”、“吴音”之名，多见经史以及其他文献之中。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荀子·儒效篇》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世说新语·豪爽》

可见楚地方言特色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有别于中原语音，与相邻吴越地区相比，亦特征明显。西汉扬雄《方言》对楚地方言多有记载，如

摧，詹，戾，楚语也。（《方言》卷一）
，极，吃也，楚语也。或谓之轧，或谓之𨔵。（《方言》卷十）

古代史册典籍中，“吴语”、“吴音”之名更屡见不鲜。

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宋书·顾琛传》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世说新语·排调》

吴越毗邻，语音亦当相近，《方言》以“吴越”连言，记载其方言词汇，多达十次之多，如：

胥，由，辅也。吴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方言》卷六）
怜职，爱也，言相爱怜者。吴越之间谓之怜职。（《方言》卷七）
煦煨，热也，干也。吴越曰煦煨。（《方言》卷七）

但与吴越楚连为一体的江西方言,在上古、中古,乃至近代都缺乏明确的定位与特定的称谓。史籍上最早对江西方言名称进行记录的,当为《南史·胡谐之传》:

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书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谐之仕宋,为邵陵王左军咨议。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家人语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顿成俚语。”

“俚音”、“俚语”当为史册上第一次对古代江西地区通行方言名称的明确记载。但这种不以地域名称命名,且带有嘲讽、轻鄙色彩的方言称谓,自然不可能被江西民众所接受,也不可能成为江西方言的代称。

江西方言在古代之所以缺乏明确定位,当在于其“吴头楚尾”独特的地理位置。方言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近年来,有学者主张从文化区域的角度对古代汉语方言进行分区。如邓晓华根据文化区域和语言区域理论,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我们可以根据史前存在的南北二大文化区域的传统,根据南北汉语的不同语言特质,把汉语分成南北汉语二大区域。又可以在南方汉语中的各个文化小区中,如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南百越文化,划分南方汉语方言区域”。(邓晓华 1993:175)江西方言无疑属于南方汉语方言区域,但其“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使我们难以确认江西方言到底属于哪一种文化范畴,属于南方方言哪一具体方言区域。

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根据《方言》所引地名进行综合分析,推定汉代方言可分为 14 系 36 个小片(参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九卷《语言学论丛》第 34 页)。其中扬雄《方言》对“南楚”之地的方言记录甚详,据林语堂统计,《方言》“共言南楚八五次,(中言南楚之外,南楚以南十次)单言南楚,不并引他地共四二次”。(同上,第 40 页)其次数之多,在全书仅少于中原的“秦晋”。

可见,“南楚方言”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方言特色,至于其范围,林语堂认为当包括“沅、湘、湘潭、九嶷、苍梧、湘源”等地。(同上,第 40 页)

刘纶鑫先生(1999a)提出,江西方言在秦汉时期,亦当属于楚语,即“南楚系”的范畴。《史记·货殖列传》明确记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则汉代江西方言亦当属“南楚系”无疑。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应当比较符合汉代以前江西方言与文化的实际情况。

汉代江西作为南楚方言的一大区域,其语音特征如何,现已无从考证。那么,他与现代江西方言的关系如何?是否现代江西“赣方言”的直接源头?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方言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变迁、人类社会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某一地域的现代方言与其历史方言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在其历史方言的基础上,传承演变而来;有的由于战争、人类迁徙等原因,其历史方言已成为失落的方言;有的虽可以从现代方言发现其历史方言个别特征的遗留,但其历史方言的基本特征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探讨江西方言的形成,探讨江西赣方言与客家方言的形成,一定要把现代赣方言、客家方言与江西地区历史方言的关系明确定位,将二者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事物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明确分析。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产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从历史文化源头看,江西地区开发历史非常悠久^①。经考古发现,江西自旧石器时代、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商周时代就已有比较先进的文明。自商代开始,江西地区的瓷业、铜矿开采与冶炼铸造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西周时期,周王朝在江西地区设立了邦国(1958年,余干县黄金埠出土“雁监甗”一件,内壁有铭文六个。经郭沫若考证,为“雁监作宝尊彝”。“雁”即应国之“应”,“监”是周王朝派来的监国者)。商周时代,江西文化已纳入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与吴、楚一样,江西地区的通用语言也应当是汉语的分支。

江西地区的语言第一次受到中原语音的影响,当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南下,“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后来又增派一万五千女子来为将士们做内勤。据《南越笔记》卷二、《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记载,汉因秦旧制,派庾胜兄弟带领军队驻守大庾岭,“大庾岭”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豫章郡空前繁荣兴旺。根据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当时全国总人口减少,但豫章郡人口由公元2年的351965人猛增至公元140年的1668906人,净增1316941人;户数由公元2年的67462户猛增至公元140年的400496户,净增333034户。在当时全国100多个郡中,豫章郡的人口名次由53位跃居第4位。在扬州部的6个郡中,也由第5位跃居第1位。当时,扬州部总人口的五分之二都住在豫章郡,足见当时豫章郡

① 本小节以下部分考古材料与移民数据参考了刘纶鑫《客赣方言史简论》。

的昌盛景象。这当与江西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鄱阳湖平原肥沃的土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繁衍生息等因素息息相关,属于江西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秦汉驻军推动了江西地区的开发,但对江西方言的影响却并不是很大,江西方言在秦汉时期,仍当属于南楚方言区的一支。

江西方言受中原语言的冲击,并逐渐融合,当始于东汉末。时值中原大乱,士民纷纷南下,江西接纳了不少移民。继之以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加剧了中原大乱的局面。江南相对安定,中原士民纷纷南渡避难。“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据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考证,当时江苏接收的中原移民最多,其次为安徽,再次为湖北、四川、河南南部、陕西北部及山东北部。至于江西,谭其骧认为:“江西、湖南二省处皖、鄂之南,距中原已远。故流民之来处者较少,且其地域仅限于北边一小部分。”(谭其骧1987:211)许怀林《江西史稿》说:“当时进入江西的流民主要在寻阳郡”,“在寻阳郡内先后设置的侨郡有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等。”(许怀林,1998:59)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浩大的移民迁徙,对江右(江西)地区的影响虽远不及江左,但开启了之后的移民路线。

江西地区的南楚方言受到中原移民方言的影响,也将面临方言属性改变的命运。这种改变,当最终形成于唐代后期。唐代安史之乱,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原大乱,士民南逃。此次移民浪潮,很自然地扩散到了江西地区。据《元和郡县志》载,唐代后期全国户口普遍减少,唯独鄱阳湖地区、赣江中游地区户口大增。江西人口,隋朝时为85638户,盛唐开元时为205973户,元和时增至293180户,历五代至宋初猛增至591870户。(参见《江西通史》第4卷第88页)除去人口自然增长,江西地区人口增长主要还是受移民因素的影响。

移民因素所带来的江西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江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江西地区方言的影响就是其中主要的方面之一。谈论江西客、赣方言的形成,必须将唐季移民对江西方言所产生的分水岭作用进行深入探讨,把江西方言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

(二)江西赣方言形成的年代

关于江西赣方言的形成年代问题,学界争议较多。罗常培(1940),袁家骅(1959),周振鹤、游汝杰(1986),沙加尔(1988),陈昌仪(1991),周静芳(1998),刘纶鑫(1999),颜森(见袁家骅2001)等都有过论述。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赣方言与客家话有过共同的源头,即“原始客赣语”。罗常培先生